

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到“共享发展” ——中国共产党共享理念发展变化研究

刘玉安 玄 理

摘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我党执政理念中的应有之意，但直到 1978 年我国仍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状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目的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改变我国普遍贫困的局面。此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收入差距也明显拉大。过去我们曾错误地把收入差距拉大视为“成长中的烦恼”，认为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之后这种差距会自然回落，结果使我国逐渐成为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收入差距过大势必引发一系列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分化，因此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共享发展既是我党的一贯宗旨，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关键词：收入差距；共同富裕；共享发展；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D1；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574(2016)03-0013-12

DOI:10.16012/j.cnki.88375471.2016.03.002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坚持共享发展，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了明显区别，表明我党的治国理政观念有了很大转变。为什么会有这种转变？这种新理念有什么依据？它能否取得成功呢？

一、为什么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古今中外的政治家都懂得：发展是硬道理。《汉书》中就有“国以民为本，民

作者简介：刘玉安，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玄理，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济南 25010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1 世纪欧洲社会民主党及其转型研究”（项目号 15BKS065）的阶段性成果。

以食为天”的说法。恩格斯也曾明确指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①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说已经不能有效地解决人们特别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无产者的吃、喝、住、穿等问题。他们坚信社会主义能够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多、更大的生产力，并明确提出：判定一种社会制度或一个政党先进还是落后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促进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1949年我党取得执政地位后，首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继而又进行三大改造，核心目标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全国人民都富起来，都过上好日子。由于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国内战争，建国初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已降至历史最低点，我党当时推行的这些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经过此后三十年的发展，我国并没有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到1978年，我国GDP只有2683亿美元，占世界GDP的1.8%，排名世界第15位；人均GDP只有155美元，在纳入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统计的137个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3位。当时我国一个副部长的实际生活水平还不如一个美国失业工人，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就更不言而喻了。典型的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这个世代代以种粮为业的村子，在人民公社时期由于产量低从来没有向国家交过一粒公粮，反倒一直靠国家提供的返销粮维持生存。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小岗村虽并未受灾，但由于国家返销粮供给的减少，结果全村120口人中还是饿死了67人，其中有6个家庭全家饿死。1978年之前，小岗村是当地远近有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收之后全村大多数人都要到外地讨饭生存。1978年，全村近1000亩耕地总共才生产3万多斤粮食，人均收入只有22元。这年底，小岗村生产队长严俊昌冒着可能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名而坐牢的风险，带领全村18户农民秘密签订了生死合同，把集体的土地分到各家自主经营，结果第二年在其他条件基本未变甚至略有恶化（为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当地人民公社对小岗村采取了扣发化肥、停止贷款等惩罚措施）的情况下，全村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斤，人均收入400多元。

在这种背景下，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要决定，开始对过去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农村集体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小岗村的做法也得到中央的肯定。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初见成效后，我国的改革探索又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领域全面展开。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发展之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重新肯定了过去长期被否定的市场机制。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决定明确提出，在收入分配问题上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5—336页。

而易见，这是对此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提法的更正式表述。党中央的这一重大决策表明，在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上，首先必须把蛋糕做大，然后讨论怎样分配才有意义。这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信条颇有共同之处。而邓小平同志则用一句更通俗的话将其表述为：不管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因为，到上世纪 9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两万美元，而 1992 年我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只有 417 美元，不及发达国家的零头，在纳入统计的 162 个经济体中我国仅排在第 124 位。

表 1 1980 -2011 年中国经济发展对照

年度	人均 GDP (美元)	世界排名	纳入统计的经济体数
1980	205	134	138
1981	168	136	138
1982	277	126	138
1983	293	123	138
1984	298	118	138
1985	290	123	139
1986	277	127	140
1987	296	123	140
1988	364	120	140
1989	400	115	140
1990	341	124	145
1991	353	121	146
1992	417	124	162
1993	517	119	164
1994	467	123	165
1995	601	121	167
1996	699	117	167
1997	771	114	168
1998	817	113	172
1999	861	112	174
2000	946	115	178
2001	1038	113	179

年度	人均 GDP (美元)	世界排名	纳入统计的经济体数
2002	1132	112	180
2003	1270	110	181
2004	1486	110	182
2005	1726	112	183
2006	2064	111	183
2007	2645	108	183
2008	3404	105	183
2009	3740	100	183
2010	4423	93	184
2011	5417	90	183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各年度资料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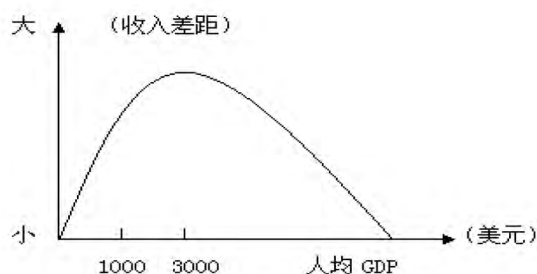
从上表可以看到,1993年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到200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大关,为5417美元,达到国际社会公认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纳入统计的世界183个经济体中排名首次进入前半区,居第90位。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会不会导致新的社会分化?套用“文革”期间最常用的一句话来说,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对此,当时党内外、学术界、政治界都普遍存在这样的疑虑,有人甚至公开质疑:这到底是在搞“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就在这个时候,库兹涅兹的理论在中国悄然传播开来,并为我国决策者增添了信心。众所周知,在美国建国初期,其收入差距曾极其悬殊,例如1860年,美国最富有的10%的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73%,基尼系数达到了0.832^①。但到了后来,美国的收入差距并没有持续扩大,反而逐渐降低。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库兹涅兹在对美国等几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研究后,于1955年3月在《美国经济学评论》发表了题为《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的文章,提出了这样一个假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长期趋势可以假设为:在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经济增长早期阶段迅速拉大,而后是短暂稳定,然后在增长的后期逐渐缩小。”^②如果用坐标来描述的话,经济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变化表现为一条倒U型曲线,这就是著名的倒U曲线理论(见图1)。

① 斯坦利·恩戈尔曼、罗伯特·高尔曼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页。

②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45 (1955), p18.

图1 倒U曲线理论



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库兹涅兹对自己的这一发现非常慎重，坦言由于掌握的资料有限，该假说尚有待进一步证实。然而，该假说还是迅速被一些信奉者视为普遍规律，他们认为，由于现代工业经济巨大的经济效益，在从传统经济向现代工业经济转型过程中，收入差距拉大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现象非但不可怕，反而有利于资本积累、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属于“成长中的烦恼”。一些经济学家甚至预测，当转型完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3000 – 5000 美元后，收入差距将开始缩小。在我国国内，当时也有一种“奔小康”的提法，认为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000 美元，即达到中等国家收入水平或小康水平，人均收入差距就会自然缩小。也就是说，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客观上为我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政策提供了根据。那么，事实真的如此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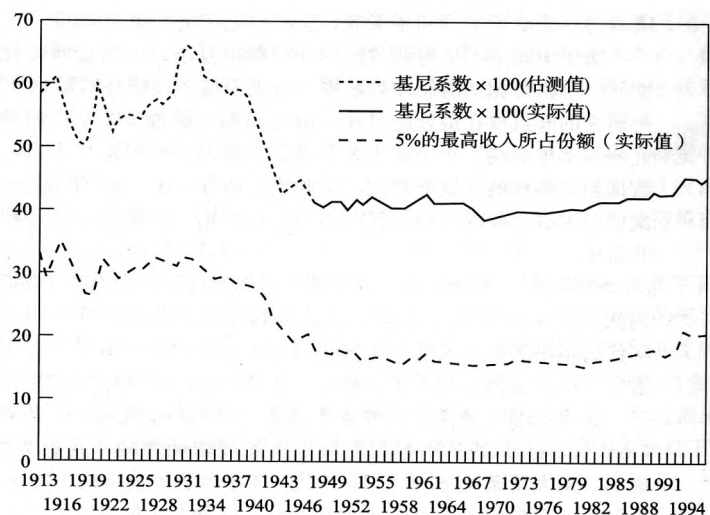
二、收入差距真的会自然缩小吗？

前面提到，1860 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创纪录 0.832，但在 1890 年反垄断法以及其他一些税法实施后，美国的财富与收入差距得到适度控制。此时，美国社会已形成一种鼓励创新、冒险和致富的文化，流行的信念是谁富有谁英雄，谁贫困谁狗熊。此外，相对于当时的欧洲来说，美国资源多、机会多，虽然一个人今天贫困，但说不定明天就能发财，因此美国社会能够容忍当时较大的收入差距，并吸引着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的投资者和冒险家前来投资、创业，大大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到 1913 年，美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均超过了其他西方国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一号工业大国，基尼系数也降到约 0.564^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最初宣布中立，利用欧洲各国忙于战争的机会大力发展制造业。虽然美国于 1917 年对德宣战，但到一战结束时几乎毫发无损，而四年的战争则使欧洲工业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战后的欧洲重建又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① 斯坦利·恩戈尔曼、罗伯特·高尔曼编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08 – 209 页。

1918—1928年，美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0年的所谓“柯立芝繁荣”。在此期间，美国的基尼系数也一直保持高位运行，其中最高的是1931和1932年，分别达到0.656和0.648^①。

图2 1913—1996年美国基尼系数与前5%最高收入者收入份额^②



从图2可以看出，1931年之后美国的基尼系数确实开始回落。在库兹涅兹提出其假说的1955年，美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差距大约呈现一种倒U曲线关系，且自二战结束直到1970年代末，美国的基尼系数一直非常稳定，维持在0.40左右。显而易见，库兹涅兹的假说主要是以美国的数据为基础的。但遗憾的是库兹涅兹忽略了一个重要条件，即美国的收入差距在1933年开始缩小不是自然发生的，而是美国政府强力干预的结果，美国人民为此曾付出了沉重的甚至是血的代价。众所周知，在经历了10年的柯立芝繁荣后，从1929年8月开始美国经济发生衰退，以这年10月24日纽约股市暴跌为开端，爆发了持续长达4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危机期间，美国共有11730家银行破产，25120家企业倒闭，1700万工人失业（占工人总数的32%），100多万家农场破产。在危机最严重的1932年，美国有半数以上家庭没有任何收入来源。美国工人阶级当时提出了“不愿饿死就必须战斗”的口号，在危机期间共有350万工人举行了2700多次罢工，还有200多万农民参加了反饥饿的请愿、示威活动。1932年5月，大约25000名参加过一战的退伍军人携家带

① 斯坦利·恩戈耳曼、罗伯特·高尔曼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209页。

② 斯坦利·恩戈耳曼、罗伯特·高尔曼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0页。

口涌向华盛顿向政府请愿，要求提前发放补偿金以解燃眉之急。尽管请愿者手无寸铁且没有提出其他要求，但胡佛总统为防不测还是下达了武力驱散的命令，制造了打死4人、打伤100多人的“血腥星期四大屠杀”，从而引发了更广泛的社会反抗运动，使美国社会面临崩溃。在此背景下，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2年10月第37届总统选举中以其“新政”主张，以绝对优势当选。

罗斯福执政后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带领美国人民摆脱已深陷其中的经济危机，为此他必须首先对危机的原因做出判断，然后才能对症下药。罗斯福认为，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就是柯立芝繁荣时期过度的自由放任主义：“使我们遭受打击的是10年的放荡无忌，10年的集团的利己主义——所追求的唯一目标表现在这种思想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结果是，98%的美国人都遭到了天诛地灭。”^①他决心改变这种局面，并做好了当最后一任美国总统的打算，而国会也授予了他只有在战时才享有的特别权力。罗斯福的所谓新政，实际上就是由国家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全面、积极的干预，包括以二次分配方式对社会收入进行调整。此后，美国的实际收入差距才开始逐渐缩小，桀骜不驯的资本主义被戴上了笼头。罗斯福之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具体政策上虽各有不同，但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实际收入差距实行总体调控的原则却始终没变。

表2 1902—1983年美国政府开支在GNP中的比重^②

年份	联邦政府	州政府	地方政府	合计
1902	2.6	0.9	4.1	7.6
1913	2.4	1.0	4.6	8.0
1927	3.7	2.2	5.9	11.8
1932	7.4	4.9	9.2	21.5
1936	11.1	4.7	4.5	20.3
1940	10.1	5.2	5.0	20.3
1950	15.6	5.3	3.7	24.6
1960	19.2	6.2	4.4	29.8
1970	21.0	8.5	4.0	33.5
1980	23.5	9.8	3.1	36.4
1983	26.4	10.0	4.5	40.9

从上表可以看到，自1932年起，美国的政府开支有了明显增加，此后基本保

^① 罗斯福 《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15—116页。

^② 斯坦利·恩戈耳曼、罗伯特·高尔曼编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页。

持直线上升的态势，到1983年已占到GDP的40%多。这么些钱花到哪里去了呢？

表3 1902—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主要开支分类(%)^①

年份	国防	邮政	教育	公路等	卫生和福利	行政和利息
1902	28.8	22.0	0.7	资料不详	0.2	47.6
1913	25.8	27.8	1.9	0.5	0.2	44.8
1927	17.4	20.1	0.5	2.6	1.2	58.1
1932	19.2	18.6	0.6	5.6	1.2	57.6
1936	10.2	8.2	3.6	8.8	5.8	63.4
1940	15.8	8.0	3.4	7.9	7.1	57.7
1950	41.0	5.0	5.5	1.1	12.7	33.9
1960	50.3	3.8	1.1	3.1	16.1	24.9
1970	40.5	3.8	1.9	2.4	24.8	24.4
1980	24.2	2.9	2.7	1.6	35.4	32.1
1983	26.2	2.7	2.9	0.3	35.6	31.6
1990	25.0	2.0	3.0	2.5	46.5	21.0

可以看出，1932年后联邦政府直接用于教育、卫生、福利等方面的开支明显增加，这三者之和差不多占到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这些开支显然是以低收入者为主要对象的，当然会缩小实际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说，美国的收入差距不是自然缩小的，而是政府积极干预的结果。通俗点说，美国GDP中的很大一部分被做成了人人有份的“大锅饭”，才使得美国的实际收入差距缩小了。

再回来看我们中国的情形。我党在革命时期之所以搞打土豪、分田地，建国后之所以搞三大改造、实行计划经济，很重要一个原因是我们不相信至少不完全相信市场机制，认为市场历来只讲锦上添花、不讲雪中送炭。我们普通人吃午餐要自掏腰包，而巴菲特吃顿午餐则能挣一大笔钱，因为与他共进午餐的价格已拍卖到最高350万美元。这就是市场经济。改革开放初期，成为“万元户”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梦想，现在年收入百万、千万甚至上亿在我国已不罕见，但同时却还有数千万人口仍没解决吃饭问题，年收入不足3000元。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只会把人们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更不可能解决精准扶贫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变化的实际情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① 斯坦利·恩戈尔曼、罗伯特·高尔曼编 《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三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36页。

为了摆脱普遍贫困落后的局面，我国自 1978 年底开始重新承认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政策上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也使我国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1978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仅为 0.16，是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1993 年以后我国收入差距加大、两极分化的现象日益加剧，基尼系数在 2000 年首次突破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 0.40 警戒线，达到 0.417，此后仍逐年攀升：2001 年为 0.447，2003 年为 0.458，2004 年为 0.465，2006 年则达到了惊人的 0.496^①。有鉴于此，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特别提出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随着此后一系列相应制度安排的实施，我国收入差距日益拉大的趋势得到一定控制，但迄今仍处在国际警戒线之上，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 2014 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2003 - 2012 年间一些国家税后收入差距的平均值如下：

表 4 部分国家税后收入基尼系数（2003 - 2012 年平均值）^②

瑞典	0.250	埃及	0.308
挪威	0.258	印度	0.339
德国	0.283	越南	0.356
英国	0.360	伊朗	0.383
美国	0.408	泰国	0.394
中国	0.421	菲律宾	0.430
巴基斯坦	0.300		

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不仅大于英美等发达国家，也大于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值得注意的是，早在 2011 年我国的人均 GDP 就超过了 5000 美元，也就是一些经济学家所预测的收入差距缩小的拐点，然而事实上这个拐点在我国并没有出现。显然，如果再不采取有效措施，我国的收入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

三、为什么要强调共享发展？

国际上之所以把基尼系数 0.40 划定为警戒线，是因为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如果实际收入差距长期保持在 0.40 以上的话，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引发一系列社

① 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各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整理。

② 联合国发展规划署《2014 年人类发展报告》，第 168 - 169 页。

会矛盾和冲突,甚至引发所谓“颜色革命”。这显然是不符合我党的执政理念的。早在1985年邓小平同志就告诫全党“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①为避免出现这样的结果,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共享发展”的理念“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这个提法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相比,显然有重大区别。

十四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我国的生产效率太低,粮食不能自给,制造业的效率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几十分之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我国人均GDP还不到400美元,排名世界后几位,与联合国当时公布的国际贫困线——每人每天1美元——基本持平,整个国家仍处于贫困状态。为了摆脱贫困落后,我们就必须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基于这样的目的,我国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制度,在企事业领域推行裁减冗员、关闭亏损企业等政策,这些措施对于打破传统计划经济模式、恢复我国经济发展活力、提高生产力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追求效率、发展经济固然重要,但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绝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必须是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的全面发展。我国在九十年代初期所采取的一些政策,如裁减人员、关闭亏损企业,虽然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一部分人的收入水平、社会经济地位,但对那些被裁减的人员、下岗职工来说,其收入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肯定会下降,也就是说,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实际上是为了效率在某种程度上舍弃了公平。

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公平永远是相对的,我们不可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具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谈论公平,同样也不能脱离效率谈论公平。效率当然主要是指人类经济活动的效率,而人类经济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法律条件下进行的,如果这些社会条件、法律条件不被认可或被认为是不公平的,社会生产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因而效率也就无从谈起。公平与效率决不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也不是猫和老鼠的关系,而是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我们这里所说的效率主要是指劳动生产率,其最基本的含义是指单位生产要素在单位时间内投入与产出的比率。劳动生产率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兴衰,因此任何一个国家社会的管理者都不会对它掉以轻心,都会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效率,区别仅在于以怎样的方式来提高。社会生产中的三大要素对生产效率都有影响,其中,劳动者对生产率的影响最敏感、最直接、最重要。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的政策并没有导致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发生太大改变,例如小岗村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种的还是那片地,种地的还是那些人,使用的还是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111页。

那些工具，但粮食产量却增加了好几倍，根本原因就在于新政策符合实际，被农民认为公平、合理，从而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劳动生产率只是一种可能的生产力，而不是现实生产力。要把这种可能的生产力转变成现实生产力，还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例如用拖拉机耕地肯定比用铁锹翻地效率要高，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农民都用拖拉机耕地，因为使用拖拉机耕地不仅意味着更大的投入，还要考虑经营的规模、道路交通等各种条件，而这些条件不是靠个人能够解决的，必须由社会来统筹考虑和解决，这就涉及到了社会总投入和总产出的比率问题，也就是效率问题。对于一个国家和社会来说，效率问题就是怎样充分利用现有经济资源来满足其全体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问题，也就是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确认，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要完全放弃宏观控制、完全由市场来主宰全部社会生活。用西方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句话来说：市场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但却是一个糟糕的主人。我们可以而且必须搞市场经济，但不能搞市场社会，正如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所说：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并不是甚至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而只是一种虚拟商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因为‘劳动力’这种所谓的商品不能被推来操去，不能被不加区分地加以使用，甚至不能被弃置不用，否则就会影响到作为这种特殊商品载体的人类个体生活”^①。

市场机制可以调动部分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可以发挥部分生产要素的作用，例如可以鼓励开发商投资住房市场，鼓励建筑商把住房建得更大、更美、更舒适，但它不能保证这些住房都能实现其自身价值——被人住上。而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国家的使命之一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全部生产要素的作用，例如保证这些更大、更美、更舒适的住房都能被人住上。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国家必须关注全要素效率，必须关注整体的、长远的、持久的社会效率。这也是十八届五中全会之所以强调“共享发展”的根本原因。

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我国的改革开放只是这一浪潮的一部分）显然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创造巨大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也拉大了收入差距，制造了新的社会紧张。为了缓和社会紧张、防止社会分裂，西方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相应措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西方各国执政党不断更替，保守政党甚至声称要砍杀福利国家，但实际上它们用于社会福利方面的开支却有增无减。

^① [英] 卡尔·波兰尼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3页。

表5 经合组织部分成员国社会福利开支（占GDP%）^①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5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丹麦	24.8	23.2	25.1	28.9	26.4	27.7	30.2	30.6	30.6	30.8	30.8
挪威	16.9	17.8	22.3	23.4	21.3	21.6	23.3	23.0	22.4	22.3	22.9
瑞典	27.1	29.5	30.2	32.0	28.4	29.1	29.8	28.3	27.6	28.1	28.6
法国	20.8	26.0	25.1	29.3	28.6	30.1	32.1	32.4	32.0	32.5	33.0
德国	22.1	22.5	21.7	26.6	26.6	27.3	23.9	23.3	24.4	24.1	22.0
英国	16.5	19.4	16.7	19.9	18.6	20.5	24.1	23.8	23.6	23.9	23.8
美国	13.2	13.2	13.6	15.5	14.5	16.0	19.2	19.9	19.6	19.7	20.0
经合组织	15.5	17.2	17.6	19.5	18.9	19.7	22.1	22.1	21.7	21.8	21.9

从表5可以看出，与1980相比，2013年英国的社会福利开支增加了7.3%，法国增加了12.2%，美国增加了6.8%，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增加了6.4%。也就是说，不管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西方发达国家都在把越来越多的资源用于“共享”。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福利开支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十八届五中全会决议表明，我们党对自己的历史使命已有非常明确的定位，相信我国将在共享发展、共同富裕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责任编辑：蒋锐）

^① 根据 OECD Factbook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Statistics 历年数据汇集整理。